

第一章 绪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1页）历史演变的不间断性规律，要求我们对历史有一个科学的辩证的态度。为此，毛泽东同志更明确地说过：“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第1版第679页）显然，我们面对历史，是面对着我们的生存背景；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弄清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现时的行动。

自古以来，秘书和秘书工作在社会网络中处于一个辅助性的从属地位，无论它的作用多么大，人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忽视它的存在。因此，历史给予它的关注少得可怜。当我们今天的秘书工作者和研究者想要在史籍中寻找关于秘书的历史状况与流变时，无不感到困难重重。因而，时至今日，关于秘书历史的研究仍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但研究是必须要认真地深入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需要全面清理秘书工作的传统。

第一节 中国秘书史研究的必要性

我们强调研究中国秘书史，并非单纯地表达着进入历史和贴近事实的意愿，更主要的是希望在弄清楚秘书工作与中国历史、秘书工作与中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同时，为当代秘书工作提供一种有价值的、事实与观念辩证统一的传统教育。

一、秘书工作与中国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文明总是以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的胸怀和精深的内涵为人津津乐道。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不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中华民族总能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中华文明总能保持其超强的生命力。尽管也有或长或短的分裂时期，但古老的中华文明从未有过完全的裂变与沉沦。相反，它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同化力，使得那些偶尔入主中原的强悍民族，无一例外地不得不接受它的熏陶，而那些外来的文化，要想勉强占得一席之地，又不得不先接受本土化的改造。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一种奇特现象，令许多文化史学家深感兴趣。对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各执其辞，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比较赞同的，那就是大一统的国家政权的延续，保证了中华文明的一以贯之，而中华文明的一以贯之，又使得国家政权的统一有了精神上的支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与稳定统一的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时至今日，统一仍然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中华文明的一以贯之与国家政权的稳定统一之间长期置衡的原因，有过许多不同的分析与解答。但这

些分析与解答往往过于侧重于主流问题、重大事件、制度层面和必然因素，完全忽视了支流问题、细小枝节、个人行为 and 偶然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历史的演变经常为枝节与偶然因素所制约。在被历史学家忽视的诸多因素中，秘书及其行为，差不多是被完全遗忘了的。也许，由于秘书工作所处位置及活动方式的特殊性，往往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它的存在与功能。但事实上，秘书工作在历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因而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从远古的传说时代到而后的信史时期，历代帝王身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衙门里，凡是有行政活动的地方，无不活跃着秘书的身影。从尧帝任“龙”为纳言，到周代“掌官书以赞治”的史官；从屈原任楚怀王左徒到杨修任曹操的主簿；从冯驩做孟尝君的门客到清代的“无绍不成衙”；从起草《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骆宾王到撰写《佐治药言》的汪辉祖；从位尊任重的翰林到不入品秩的书佐……任何一代帝王，任何一个官员，任何一个衙门，都离不开秘书为之服务。这些大小、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秘书人员，在帝王与官员之间，在官员与百姓之间，在衙门与民众之间传递信息、处理公文、协理事务，任劳任怨，为国家机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转，默默地服务着。很难设想，在整个社会管理网络中，可以缺少他们这一个群体，这一个环节。这是一种常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常识性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是可以忽视的东西。相反，应当把它摆到更重要的地位来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秘书工作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秘书工作与中国文化

秘书工作与中国历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样，它与中国文化有更加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独特文化模式的形成与秘书人员的行动直接有关。正像许多文化史家所认识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

民族这样具有明显的文化历史化的特点。文化历史化具有许多因素与标志 其中 最显著、最不可置疑的 是典籍的地位与作用。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有许多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秘书制作并保存下来的。

比如说《尚书》，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上古时代的政治文件汇编。目前 关于《尚书》的部分内容的真伪 关于它的成书时间与作者等问题尚有一些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一部分内容，而且是大部分内容是可信的，它成书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春秋初期。至于它的作者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者在辑录这本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的典籍时，他所根据的原始材料的来源。从它的内容性质分析，它的来源只可能是古代秘书人员制作并保存下来的。比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它充分地利用了周代早期史官的记录。据《周礼》中说：宰夫有八职 其中“六曰史 掌官书以赞治”。汉代郑玄注释说：“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由此可见，周代史官的职责主要是起草文书和记录周王的言行。《周礼》中说得很明白：“动则左史书之 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们记录下来的关于周王的言行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后世修史者的原始依据。尤其重要的是 史官们在坚持‘君举必书’的原则的同时 更兼有以舆论监督君王言行的责任，即以手中之笔约束君王“法先王之法”的责任。这事实上就表明了史官记录历史的时候必须遵循某种道德原则。如此一来，史官们的记录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事实的记载，它还承担了传递道德法则的义务。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正是从这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料。所谓“六经皆史也”正是就此而言。

当我们将对中国文化追本溯源时，我们无不惊奇地发现，中国文化的源头与秘书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用说仓颉（黄帝的秘书 造字并教民众作书 不用说孔甲 黄帝的另一个秘书 把书制在盘盂中保存起来；其它原始文化的标志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

帛书等等无不与秘书工作有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我们还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中国历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学者大多充当过秘书，或有过起草公文的经验。从老子到屈原，从贾谊到李白，从苏轼到蒲松龄，这几乎是一个可以与文学名家等列的名单。尤其有意思的是，在流传至今的我国古代文献中，公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史类文献如《尚书》自不待言即使是文艺类文献也是如此。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文选》、《全唐文》、《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等就收录了大量公文。

三、秘书工作传统与现时代的秘书工作

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上，传统已经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秘书工作传统也不例外。以详实的史料、科学的方法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分析秘书工作的发展史，对批判继承中国丰富的政治文化遗产，批判继承丰富的秘书工作遗产，促进秘书工作不断提高水平，确立秘书行为的主体意识，都是很有必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就意味着历史的经验。经验有正有反，传统亦有正有反。在中国文化的诸多传统中，正面的东西和反面的东西往往令人惊奇地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经验与教训或精华与糟粕往往并存于同一事物之中。因此，人们面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时，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同时也使得批判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变得十分困难。秘书工作传统也是如此，下面我们择其主要者略加分析：

1. 积学

知识对秘书的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似乎已成为所有秘书的共识。在中国古代，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个层次的秘书无不具有广博的知识。比如历代帝王任用的辅助者，不仅要成为帝王与官员之间的桥梁，也应当是帝王的谋士（智囊）甚至成为帝王之师。这个辅助者一定是一个具有很高学识的人。换一句话说，在那样的政治体制当中，对秘书而言，学识是压倒其它一切因

素的首要素质。对学识的重视无疑是古代秘书工作对现时代秘书一种有益的启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秘书在学识问题上有偏重于“学”而忽视“识”的倾向，单纯秀才型秘书很多，而学识俱佳的秘书较少。

2. 晓事

所谓晓事，指的是秘书人员在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以及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有深切的了解的基础之上，能通晓各种办事渠道、办事程序和办事方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古代秘书需要比现代秘书承担更多的信息传播与办理事务的职能，因而也就练就了他们相应的能力。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下的秘书，往往将其精明的办事本领变为营私舞弊的手段，“清官与胥吏共天下”的教训不仅在清代有，以前各朝各代亦屡见不鲜。其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政府预防措施是否得力，以及秘书本身政治素质的高下。

3. 立诚

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包括诚实、正直、守信用，也包括忠诚，甚至还包括影响力，因而它是一种综合性品格。秘书在社会管理网络中承担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沟通左右的责任，不“诚”则危害极大，故中国古代十分强调秘书人员要以“立诚”为本。不过，正因为立诚所具有的多义性质，使得秘书很难真正将诚实、忠诚与影响力完全融合到一起。比如，要真正做到对统治者形成“言听计从”的影响力，就难以保证秘书自身的完全诚实。也就是说，“诚”本身的多重含义让秘书在具体问题上面临着选择的左右为难。

4. 得中

中是中间、中庸、不偏不倚，得中是对一种行为方式的把握。这种行为方式的核心是持中守衡，两全其美。秘书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要求他们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中国古代的秘书们是深谙个中三昧的。然而，一味地持中守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以

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有百害而无一利也。”这和孔子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是同一个意思，即持中守衡是根本，但有时难以完全做到，这时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虽然我们不必对秘书的持中守衡（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圆滑世故）作社会伦理意义上的评判，但必须正视它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某种缺陷。

5. 养耻

耻是羞耻或廉耻，养耻就意味着要培养一种羞耻之心，要知廉耻。古人说：人无廉耻，百事可为。秘书职业是接近于权力核心的近水楼台，秘书要放纵自己的话，是很容易获取许多利益的，同时也很容易犯错。历代统治者对秘书人员在道德修养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部分地说明了秘书在这个问题上的令人不放心。

6. 去忍

忍是忍让，去忍就是不要忍让。作为一种行为规则，这是最能反映中国古代秘书两难处境的地方。一方面，中国从史官文化时代至迟在周朝就已形成了“秉笔直书”的谏诤传统，另一方面，秘书职业的特殊性要求秘书必须秉承统治者、领导者的意图办事，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桎梏。唐初，有人上书唐太宗，建议他清除身边的佞人。唐太宗说，我不知道谁是佞人。上书人出主意说：你只要找个理由佯装发怒就会试出来，凡是不畏雷霆、直言进谏的人是正人，顺意阿旨者就是佞人。唐太宗拒绝了，他说：“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反以责臣下之直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虽然它的目的在颂扬唐太宗的贤明，但我们却可以体味出辅助者（当然包括秘书）行事的艰难。专制政治要求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绝对忠诚于君主，对各级官员而言，这不言而喻，但对秘书而言则是件难事。难就难在秘书面对忠诚于君主（国家）与忠诚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时，他无所适从。因此，“去忍”作为一种政治素质要求，对秘书而言并不是绝对的。

7. 慎独

慎是慎重、谨慎，独是独处。秘书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管理组织之中，都处在一个或几个官员身边。无论是组织还是官员，都意味着一种权力。在中国古代的官本位社会状况下，权力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凡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是非，权力越大，是非越多。尽量谨慎地独处，尽量避免招惹是非，对秘书来说既是保全自身的需要，也是工作的需要。三国时的杨修作为曹操魏王府的主簿（秘书长）因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 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8. 谨慎几微

几与微都是细小的意思，谨慎几微就是不忽略小事。秘书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事务性工作，繁杂而琐碎，但每一件看似毫不起眼的小事，往往会引起大的变动。一个优秀的秘书首先应该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易·系辞》中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几也 故能成天下之务。”传说中的鬼谷子也有云：“捭贵周 阖贵密 周密贵微。”作为领导者的助手与参谋，秘书应该善于观察，善于从细节上发现事物的苗头，然后先人一步思考问题，先人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谨慎几微绝对不能等同于谨小慎微。作为秘书的行为特征，这两者是很容易混为一谈的。

上述八点只是中国古代秘书工作传统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其它如师爷气、以不变应万变、机智幽默等等均未论及。总而言之，漫长的秘书工作历史给现时代的秘书工作留下了一大笔财富。面对这笔财富，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科学地对待之，继承那些对我们有用的精华，而扬弃那些对我们有害的糟粕。

第二节 中国秘书史的研究方法

虽然秘书工作在中国历史的推进与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则还是近几年的事。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剑宇先生所著的《中国秘书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关于中国秘书史的著作。此前关于秘书工作的论述大多是零散的，而且主要集中于文书与档案方面。清人张廷铨辑录的《入幕须知》收录有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佚名的《刑幕要略》、万枫江的《幕学举要》和王又槐的《办案要略》等关于幕僚的工作任务、原则与技巧等方面的著作。虽然它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幕僚（私人秘书）问题有过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但仍然只能算是经验化色彩很强的教科书，殊难视为一种专门的历史研究。近人许同莘有《公牍学史》、徐望之有《公牍通论》等等，对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偶有涉及，且许多见解精辟而深刻，但也仅仅只是围绕公牍所作的阐发，而不是系统研究秘书工作历史。今天，在众多秘书工作者和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秘书学已经逐渐成熟并取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学科，秘书学不可避免地需要总结、清理、研究我国历代秘书工作遗产，掌握我国秘书工作的规律；“鉴往知来”以便更好地指导现时代的秘书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一节有过较为详尽的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中国秘书工作的历史，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中国秘书工作的历史。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着手研究中国秘书工作的历史的时候，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正如前文所述，这项专门史的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以往可借鉴、参考的东西少而又少。其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有关秘书工作的记载稀少而

零星，尤其是中下层秘书及其活动大多湮没无闻，因而史料的搜集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第三，中国秘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难以划定。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表现方式复杂多变，有时甚至是扑朔迷离的。历代冠以“秘书”二字的机构与人员不一定具有秘书性质，而无此二字的却承担着秘书工作任务；有的部分地承担着秘书工作同时兼管其它事务如秦朝的御史大夫既收受奏章协助丞相领导皇帝的秘书机构，又负有监察百官、保管图书秘籍等职责；有的专司某一项秘书业务，如东汉的尚书郎只管起草文书；有的机构原为秘书机构，后又演变为非秘书机构，如秦代的丞相府；有的原为非秘书机构，后又演变为秘书机构，如唐代的翰林院。凡此种，都说明中国古代的秘书与秘书机构名称变化频繁，名实淆乱，要划定一个准确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要理清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基本线索并非易事。

然而，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不可能。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为秘书史研究提供了最坚实的资料基础，丰硕的历史学成就为秘书史研究提供了可借参考的体系框架，尤其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秘书史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因此，秘书史的研究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方法论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初创阶段的学科尤其如此。秘书史的研究必须很好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必须充分地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必须利用丰硕的历史学成就，这是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就是具体方法的把握了。

首先，必须大量地占有材料。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古代文献非常丰富，但有关秘书工作的记载却稀少而零星，这就要求我们花很大的力气从官方的、民间的各种文献中去搜集有关史料。这是一项细致而艰巨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占有材料的丰富程度，将决定秘书史研究水平的高低。其次，必须认真考证与鉴别所占有的史料。我国现存史料大多是史官在“秉笔直书”与“秉笔难书”的

两难处境中记录下来的，可靠的东西当然是主要的，但不可靠的也为数不少。比如唐太宗和明成祖为了表明他们继位的合法性，就曾篡改了不少史实。因此，我们所见的史料与客观的历史尚不能完全等同。事实上，历史学家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史料真伪的辨别。第三，必须重视把历史研究的方法与逻辑推理的方法结合起来。所谓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在搜集、考证、鉴别、整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地再现历代秘书工作现象，然后加以分析研究，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寻找其规律与启示。所谓逻辑推理的方法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条件推导出一个结论的思维方法。各种文献中关于秘书工作的史料都具有间接的分散的特点，难以直接反映出秘书工作的全貌，需要将这些史料放在一起比较分析，进而推导出相应的结论。值得指出的是，单纯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单纯的逻辑推理方法都可能导致结论的片面性，在讨论各种秘书工作历史事象时，必须注意二者的结合。比如在汉代，朝廷为了削弱相府的权力，以便保证君权的绝对权威地位，遂将在秦代处于一般秘书地位的尚书组织起来，设一独立官衙，称尚书台，部分地取代相府的权力。至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几乎完全取代相府，史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而到了曹魏时代，尚书台过大的权力又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于是设中书监与中书令以分尚书之权。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皇帝身边的核心秘书机构的权力重心总在中书、尚书与门下三者之间摇摆不定，至隋朝时遂形成完整的三省制。从尚书台取代相府的地位起到三省制的形成的全过程，充分说明封建皇帝设置秘书机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其君主独裁，秘书机构必须是完全听命于帝命的服从机构。一旦这个机构的职权过于膨胀，导致皇权的分散，皇帝就会认为它可能威胁自己的统治，必将予以抑制、削弱，乃至直接解散，而重新设立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的秘书机构来取而代之。这种现象自汉代始，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反复出现，形成了一条规律。它导致封建社会中央秘书机构与人员处于频繁变动的周期性演变之中，具有明显的不稳

定性。这也就是历朝历代秘书机构与人员名称变更频仍、秘书工作内容反复交叉重叠的根本原因。这一规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显然,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很难以单纯的历史方法或单纯的逻辑方法所能达成。它必须将前后几个时期的一些典型史料放置一起,作合乎规律的比较研究,方能找出其共性,准确地揭示其中的必然的逻辑结果。

第三节 中国秘书史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首要任务就是界定并阐释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言:“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这些特点可以是对象的不同或者是知识源泉的不同。”(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页)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秘书工作现象与规律的专门史,中国秘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殊难划定。其原因在上文有过简单交待。在中国古代没有“秘书工作”这个词,而“秘书”一词虽然有,但涵义与今天所称并不完全一样。它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指宫禁中的秘藏之书。“秘”最初写作“閤”,亦写作“祕”,许慎解释其本义是神秘。《汉书·刘向传》中说:“诏向领校五经秘书。”《晋书·荀勖传》中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为秘书。”都是指的宫中秘藏之书。这也是“秘书”一词最原始的含义。

第二,指谶纬图篆等书。“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与“经”相对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因谶纬源于古代关于河图

洛书的传说 故以“图讖”连称此类书。《说文》中说：“秘书说曰：日月为易。”段玉裁注解认为：“秘书，谓纬书。”

第三，指官名。东汉桓帝时创设秘书监一职，掌宫中图书秘籍。曹操改秘书监为秘书令，掌尚书奏事，与今天的秘书长差不多。以后许多王朝均设有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等官名，或从事典籍修撰，或执掌文书图籍，其职责范围多变不定。

第四，指官署名称。晋时始设秘书寺，南梁时改为秘书省，领有国史、著作两局，主管国史编修与著作事务。此后，历代沿置，至明时并入翰林院。满清入关前后，于内三院中设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邦往来书札及敕谕、祭文等，并抄录各衙门奏疏及词状。

上述四种解释中，除了曹操时的秘书令与清代的内秘书院直接承担一些秘书工作之外，其余均与秘书工作无直接关系，充其量只是处于秘书工作的边缘，而历代秘书工作大多是由不冠以“秘书”二字的机构和人员来承担的。因此，要将历代秘书工作整理成专门史，无法从冠以“秘书”之名的机构与人员着手，而必须参照现时代秘书与秘书工作的概念来划定其研究对象与范围。我们今天关于秘书与秘书工作的概念尚不一致，仍处于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但一般都认为，秘书工作是协助领导综合信息、研究政策、协调关系、管理文书档案、办理事务的辅助性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称秘书。根据这种理解，本书将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范围确定为：

- 第一，记录帝王、长官言行与政治活动、事件；
- 第二，拟制与保管文书；
- 第三，制作与保管档案；
- 第四，了解下情，传达旨令；
- 第五，出谋划策，拾遗补阙；
- 第六，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和交办事项。

凡承担上述全部或一项工作的官署或人员大体上就是具有秘书工作性质的机构与人员。之所以说是大体上，是因为这毕竟是

以现在的标准来划定的，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自有其与现时代秘书工作不同的地方。而且这种不同有时是根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的。在以后的叙述与分析之中，本书尽量避免以今非古，而力求反映出古代秘书工作的特殊性。

根据以上对古代秘书工作的划定，本书确定以下内容为其研究对象：

(1) 历代各级各类秘书机构的设置、职能、地位、作用和演进过程。鉴于历代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政务中枢，其秘书机构相对地方政府而言较为健全，史籍记载也较为详尽，故在各级各类秘书机构中以研究中央秘书机构为主，然后再旁及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军队内的秘书机构。

(2) 历代秘书人员的地位、功能、选拔方法、素养及其与时代有关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任何时候，秘书工作都是一种人的行为。人的主体性地位在秘书工作中如在其它领域一样具有同样的决定性意义。对秘书人员的研究无疑应该成为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3) 秘书工作制度的产生与演变。秘书工作作为一种辅助性事务性工作，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特征十分明显。制度作为秘书行为情境中的主体，对秘书的约束作用是巨大的。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制度，包括文书、档案工作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丰富的内容之一。它的许多方面对现时代的秘书工作仍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历代可考的著名秘书的事迹与心理分析。在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行政人员之中，秘书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无疑都是最高的。但自古至今，秘书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使得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与社会评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人们总以“幕后英雄”要求他们，对待他们。因此，以秘书身份录入史册者并不多见。现在可考的秘书大多并非终身从事秘书工作的人物。本书介绍的秘

书主要是一度担任秘书官职之后又转任他职的有影响的人物，以及因某种特殊机缘而在史籍上留有名迹的一般秘书。

第四节 中国秘书史的研究任务

秘书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到行政活动的效率，与社会发展关系甚大。它如果能充分发挥其职能，则能使政令畅通，国家机器运转顺利，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几个黄金时期的史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唐太宗十分重视秘书机构和官员的“沟通上下”的纽带作用与敢谏常谏的参谋作用，成为形成“贞观之治”的一大因素。反之，则会招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南齐萧宝卷在位时，秘书机构职责不明，荒怠职守，全国各地上呈的奏章经常被主管人员任意取去包鱼裹肉，一时朝政混乱，政令不通，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不安。

纵观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发展史，大多数统治者都能像唐太宗那样充分认识到秘书工作的重要性，使得广大秘书人员大有用武之地，在中国社会发展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当今的秘书工作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毫无疑问，中国秘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清理这笔遗产，为当今的秘书工作服务。具体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的任务是：

(1)理清中国秘书史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力求准确地反映中国秘书工作史的全貌。作为一种专门史，它必须力求接近历史，真实地叙述中国秘书史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首要原则，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将成为分析研究各种秘书工作事象的基础，成为寻绎秘书工作发展变化规律的线索，成为开拓当今秘书人员视野的桥梁。总之，它将成为一种知识背景，一种我们总结

过去，面向未来必不可少的事实前提。

(2)分析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机构设置、人员选拔与制度建设诸方面的各种事象，力求寻绎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找出对当代秘书工作有借鉴作用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时代的秘书工作服务。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依附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之上，时间的跨度又十分的漫长，能发生的事是数不胜数的，为后世秘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与启示。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同在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它们总结出来，分辨清楚。

(3)研究古代著名秘书的事迹及其特殊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心理状态，帮助当今秘书人员确立自身的创造主体性。秘书的创造主体性问题一直是被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的问题。这种忽视有一个人们在潜意识中认为是真实的而事实上是假想的前提，那就是秘书是辅助者，被动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体意识。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秘书人员进行认真的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一个真正优秀的秘书，正是一个极具主体意识的秘书，从冯驩的不平则鸣到魏征的敢谏；从屈原的痴忠到解缙的机智，无不闪烁着秘书人员创造主体意识的光辉。因此，对古代著名秘书的研究，既可对当今秘书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又能帮助他们确立自身的创造主体性。

本书作为企图全面展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历程、系统清理中国秘书工作传统的专门史著作，它所面对的是上下几千年的时间跨度、纵横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距离，以及数十个淹没了无数高贵的或卑下的灵魂的封建王朝。显然，本书无法真正涉及到古代秘书工作的每个角落。本书希望做到的，也许能够做到的只是在对当代秘书工作有益的假定前提下，去揭示秘书工作每一层面中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无疑是一种选择，一种在某种价值观念指导下的有意为之。为此，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历史“应当如是”演变的偏见，而更看重于历史“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的探析。

正如任何一种选择都是一种冒险一样，本书也是一种冒险。唯一希望的就是，本书的冒险不致于毫无意义。